

# 被关注成长的一代

## ——一项关于“90后”青少年发展状况分析

杨 雄 何 芳

**摘要:** 本文运用“上海青少年发展状况”调查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对“90后”一代发展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分析结果发现,“90后”青少年总体发展状况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其中,青少年的身体状况发展水平较高,社会生活、家庭生活、心理健康方面的发展水平居中,学校生活方面发展水平较低。年龄、学校类型和城乡差异是影响“90后”青少年发展的关键因素。针对时下对“90后”青少年的“标签化”论断,本文认为,应该将青少年研究视角从“问题”取向转为“发展”取向,将青少年看作有待开发的积极个体。

**关键词:** “90后” 青少年 发展

当人们正在讨论“80后”一代能否“三十而立”的问题时,“90后”青少年又开始进入社会所关注的视野。时下对“90后”青少年某些问题行为及一些负面公共事件,经媒体特别是网络媒体放大后,引起公众担忧。“90后”青少年真实发展状况是怎样的呢?这是本项研究所关注的议题。本文运用上海青少年发展状况(样本=1600)调查数据所呈现的代际特征,以期对影响“90后”成长的相关因子进行分析、归纳与解释。<sup>①</sup>

### 一、研究设计与样本数据

为了对“90后”青少年发展状况作较为深入观察,本项研究对城市青少年发展指标进行了综合考量。目前青少年发展指标尚无统一的国际标准,但一些国际组织所设计并进行了多年追踪研究的青少年发展指标可为我国进行青少年发展状况调查提供借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简称 UNICEF)2007年发布对21个发达国家儿童状况的评估报告,该报告根据《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的内容,选择物质福利(Material well-being)、健康与安全(Health and safety)、教育品质(Educational well-being)、伙伴和家庭关系(Family and peer relationships)、行为与危险(Behaviors and risks)、自我感觉(Subjective well-being)作为衡量发达国家儿童状况的六大指标(UNICEF,2007:47)。这六大指标包含40项与儿童生存和权利相关的二级指标,内容涵盖儿童的身体状况、学校教育、家庭关系、同伴关系、问题行为、心理健康等方面。而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简称 WHO)2008年发布的一项报告,则从四个维度对41个国家和地区的学校青少年发展状况进行评估:(1)社会背景(Social Context),包括家庭、同伴和学校;(2)健康表现(Health Outcomes),包括对自身健康、生活的满意度,对自身身体的看法、身体伤害、肥胖等;(3)健康行为(Health Behaviors),包括进食、口腔、减肥、锻炼以及看电视等;(4)风险行为(Risk Behaviors),包括吸烟、酗酒、吸毒、性行为、斗殴、欺负等(WHO,2008:18-163)。

上述两项跨国性的研究报告在指标设计上着重于青少年作为个人的生存、权利和发展问题,但较少从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的关联出发来观察儿童或青少年的发展状况,即对作为社会成员和国家公民的青少年所应具备的知识、能力和权利等几乎没有提及。在这一方面,由香港青年发展议

<sup>①</sup> “上海青少年发展指数调查研究”系上海市精神文明办、上海家庭教育研究会重点课题,由上海社科院青少所、上海市精神文明办未成年人处、市妇联儿童和家庭工作部课题组共同主持,调查于2009年3-6月实施。

会(Hong Kong Development Youth Council)与香港城市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主持的纵时性项目“香港青年发展指标研究”则提供了补充。该项研究设计了包括德、智、体、群、美等方面的二十个指标,尤其注重作为社会成员和国家公民的个体发展。其中有关德育的指标包括操守、社会和谐的高度重视、社会进步的诉求及道德行为意向,有关群育生活的指标包括独立及主动性、领导才能、民主意识、对民主制度支持、法治意识、民族观念及国际视野(香港青年发展议会、香港城市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1998-2001)。

本研究在选取指标时则将上述两种研究取向结合,同时兼顾到青少年个体生存发展权利以及国家、社会对青少年提出的要求。在借鉴上述国内外青少年发展指标的基础上,从五个方面测量上海青少年的发展状况:(1)身体状况,包括睡眠时间、患病次数、体育锻炼3项指标;(2)学校生活,包括学业压力、学习效能感、师生关系、同学关系4项指标;(3)家庭生活,包括家庭环境、父母教养方式、亲子关系3项指标;(4)社会生活,包括社会责任感、公民意识、国家意识、社会安全感、社会适应、诚信6项指标;(5)心理健康,包括幸福感与快乐感、情绪稳定性、自我认识、自信、成就感、自我监控能力6项指标。指标架构如表1所示:

表1 青少年发展指标架构

一级指标	身体状况			学校生活			家庭生活			社会生活						心理健康						
二级指标	睡眠时间	患病次数	体育锻炼	学业压力	学习效能感	师生关系	同学关系	家庭环境	父母教养方式	亲子关系	社会责任感	公民意识	国家意识	社会安全感	社会适应	诚信	幸福感与快乐感	情绪稳定性	自我认识	自信	成就感	自我监控能力

表2 样本基本变量的描述性分析

指标	频数	百分比	指标	频数	百分比
学段(N=1612)			学校(N=1612)		
小学	516	32.0	重点	692	42.9
初中	675	41.9	普通	723	44.9
高中	421	26.1	民办	197	12.2
区域(N=1612)			居住地(N=1600)		
卢湾区	319	19.8	市区	1258	78.6
长宁区	284	17.6	城镇	290	18.1
闸北区	321	19.9	农村	52	3.3
浦东新区	382	23.7			
金山区	306	19.0	父亲教育程度(N=1593)		
			初中及以下	244	15.3
性别(N=1598)			高中	537	33.7
男	737	46.1	大学	812	51.0
女	861	53.9			
			母亲教育程度(N=1539)		
户籍(N=1600)			初中及以下	294	19.1
本地	1399	86.8	高中	519	33.7
外地	201	12.5	大学	726	47.2
父亲从事的职业(N=1580)			母亲从事的职业(N=1557)		
体制内领导干部	135	8.5	体制内领导干部	79	5.1
经理人员	340	21.5	经理人员	229	14.7
私营企业主	175	11.1	私营企业主	90	5.8
专业技术人员	225	14.2	专业技术人员	320	20.6
办事人员	117	7.4	办事人员	152	9.8
个体工商户	88	5.6	个体工商户	77	4.9
商业服务人员	85	5.4	商业服务人员	196	12.6
产业工人	197	12.5	产业工人	144	9.2
农业劳动者	6	.4	农业劳动者	10	.6
军人、警察	54	3.4	军人、警察	12	.8
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	37	2.3	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	102	6.6
其他	121	7.7	其他	146	9.4

根据表 1 指标设计,本研究编制的调查问卷共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考察青少年身体状况、家庭生活、学校生活、社会生活、心理健康等五方面状况,共 69 个项目;第二部分为个人基本资料,共 5 个项目。每个指标依靠 2 项到 6 项问题来量度,从多角度来看一个问题以增加指标的信度及效度。问题主要分为两类,一类为评价性问题,要求调查对象根据对每个选项的同意程度做出选择,采用利克特五点计分;另一类为描述性问题,目的在于说明原因、解释和补充。同时,将问题随机分布在问卷内,以避免问题排列次序对答案产生影响。此外,为免问题的方向一面倒而产生“默认”(acquiescence)的效应,问卷中同时使用正向和负向的问题来量度同一指标。对于正向的题目,同意程度越高,得分越高。反方向的项目,得分的方式相反。最后,各指标分数可以利用因子分析得到一个因子化的指针分数。

调查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结合区域发展特点和学校类型选定了上海市卢湾区、长宁区、闸北区、浦东新区和金山区的 15 所中小学作为调研单位(每区抽取小学、初中、高中各一所),年级分布包括从小学三年级到高中二年级(初三除外)的 8 个年级,共计 1613 人。全部回收 1613 份问卷,有效样本数 1612 份。样本的基本情况参见表 2。

## 二、“90 后”青少年发展状况及影响因子

(一)“90 后”青少年综合发展总体状况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其中,身体状况的发展水平最高,社会生活、家庭生活、心理健康发展水平偏高,学校生活发展水平偏低

本研究通过“身体状况”、“学校生活”、“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心理健康”五个维度来测量青少年发展状况。由于这些指标均为间接测量指标,不能直接相加,因此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对每一指标进行合并变量,通过主成分法分析,采用方差极大化方法对因子负荷进行正交旋转,得出各项指标的新因子。然后,以新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权数,按标准分转换为 1-100 之间的数值,得出各项指标的分值:身体状况、学校生活、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心理健康五项指标的分值依次为 82.77 (SD = 22.47)、53.46 (SD = 17.37)、69.13 (SD = 15.78)、73.10 (SD = 14.17)、66.26 (SD = 19.15)。为了看出综合发展状况,我们将五项指标的分值相加并标准化,得出青少年综合发展状况的分值为 64.73 (SD = 15.18) (见表 3)。

表 3 “90 后”青少年的综合发展状况

发展指标	N	平均值	标准差
身体状况	1609	82.77	22.47
社会生活	1498	73.10	14.17
家庭生活	1560	69.13	15.78
心理健康	1375	66.26	19.15
学校生活	1541	53.46	17.37
综合发展	1207	64.73	15.18

(二)青少年综合发展水平呈现出随着年级的增加不断地降低的趋势,在小学五年级与初中预备班之间的落差最大。方差分析表明,“90 后”青少年综合发展水平在不同年级间呈现显著差异

为了呈现不同年龄段青少年的发展趋势,本研究将各年级青少年的综合发展水平进行比较(参见图 1)。结果发现,综合发展水平从高到低分别为小学五年级(M = 74.25, SD = 14.44)、小学四年级(M = 73.89, SD = 16.49)、小学三年级(M = 72.75, SD = 14.84)、初中预备班(M = 65.40, SD = 14.52)、初中一年级(M = 61.89, SD = 14.21)、初中二年级(M = 59.72, SD = 12.83)、高中一年级(M = 58.84, SD = 11.58)、高中二年级(M = 57.49, SD = 11.65)。



图 1 各年级段“90 后”青少年综合发展水平

为了进一步探讨影响青少年发展的具体因素,我们将个体特征变量(性别、年龄)、学校特征(重点、普通、民办)、家庭特征变量(居住地、户籍、父亲教育程度和父亲职业归属)等三类变量分别引入各发展维度的线性回归方程(见表 4)。从表 4 可以看出,自变量对青少年的综合发展的解释力为  $R^2 = .177$  ( $F = 19.181, p < .001$ ),达到了显著水平。从具体因子来看,对身体状况、学校生活、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心理健康的解释力分别为  $R^2 = .023$  ( $F = 3.644, p < .001$ )、 $R^2 = .220$  ( $F = 31.405, p < .001$ )、 $R^2 = .112$  ( $F = 14.859, p < .001$ )、 $R^2 = .221$  ( $F = 30.866, p < .001$ )、 $R^2 = .189$  ( $F = 23.568, p < .001$ ),解释力均达到显著水平(参见表 4)。

表 4 青少年综合发展水平的 NOVA 分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显著性
组间	49910.275	7	7130.039	37.476	.000
组内	228114.965	1199	190.254		
总计	278025.240	1206			

(三)“90 后”女生的综合发展分值均比男生高;公立学校学生的综合发展指数显著高于民办学校学生;年龄增长与青少年综合发展水平呈反比;市区青少年综合发展水平比郊区青少年为高;单亲家庭子女的综合发展水平显著低于其家庭

下面呈现的是对“90 后”青少年的个体、学校和家庭三个变量特征所做的回归分析结果。

个体特征变量。男生对综合发展、身体状况、学校生活、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心理健康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621$  ( $p > .10$ )、 $1.102$  ( $p > .10$ )、 $-2.027$  ( $p < .05$ )、 $-1.986$  ( $p < .05$ )、 $-1.311$  ( $p < .05$ )、 $2.009$  ( $p < .05$ ),即男生的综合发展、身体状况、学校生活、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心理健康分别比女生低 .621 分、高 1.102 分、低 2.027 分、低 1.986 分、低 1.311 分、高 2.009 分,其中,性别对综合发展和身体状况的影响未达到统计显著水平,表明男生的学校生活、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水平显著低于女生,而在心理健康水平上显著高于女生。

年龄对综合发展、身体状况、学校生活、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心理健康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2.315$  ( $p < .001$ )、 $.349$ 、 $-2.989$  ( $p < .001$ )、 $-1.668$  ( $p < .001$ )、 $-2.540$  ( $p < .001$ )、 $-3.003$  ( $p < .001$ ),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青少年的年龄每增加 1 岁,其综合发展、身体状况、学校生活、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心理健康分别减少 2.315 分、增加 .349 分、减少 2.989 分、减少 1.668 分、减少 2.540 分、减少 3.003 分,其中对身体状况的影响未达到显著水平,说明随着年龄的增长,青少年的学校生活、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心理健康以及综合发展水平都将显著降低。

学校特征变量。重点学校和普通学校对青少年综合发展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2.911( $p < .05$ )和 6.329( $p < .001$ ),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重点学校和普通学校的学生的综合发展分别比民办学校高出 2.911 分和 6.329 分,并且这些差异均达到了显著水平,说明普通学校和重点学校学生的综合发展均显著高于民办学校的学生,其中普通学校学生的综合发展水平最高。

在身体状况方面,重点学校和普通学校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324( $p > .10$ )和 3.570( $p < .10$ ),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重点学校和普通学校的学生的身体状况分别比民办学校高出 .324 分和 3.570 分,其中普通学校的影响达到了统计上的显著水平,说明普通学校学生的身体状况水平显著高于重点学校与民办学校的学生。

在学校生活方面,重点学校和普通学校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2.392( $p < .10$ )和 7.256( $p < .001$ ),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重点学校和普通学校的学生的学校生活分别比民办学校高出 2.392 分和 7.256 分,并且这些差异均达到了显著水平,说明普通学校和重点学校学生的学校生活水平均显著高于民办学校的学生,其中普通学校学生的学校生活水平最高。

在家庭生活方面,重点学校和普通学校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2.603( $p < .05$ )和 4.688( $p < .001$ ),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重点学校和普通学校的学生的家庭生活分别比民办学校高出 2.603 分和 4.688 分,并且这些差异均达到了显著水平,说明普通学校和重点学校学生的家庭生活水平均显著高于民办学校的学生,其中普通学校学生家庭生活水平最高。

在社会生活方面,重点学校和普通学校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375( $p > .10$ )和 3.456( $p < .01$ ),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重点学校和普通学校的学生的社会生活分别比民办学校高出 .375 分和 3.456 分,其中仅有普通学校的影响作用达到显著水平,说明普通学校学生的社会生活水平显著高于重点学校与民办学校的学生。

在心理健康方面,重点学校和普通学校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2.575( $p > .10$ )和 6.103( $p < .001$ ),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重点学校和普通学校的学生的心理健康分别比民办学校高出 2.575 和 6.103 分,其中仅有普通学校的影响作用达到显著水平,说明普通学校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显著高于重点学校与民办学校的学生。

家庭特征变量。市区、本地户口和是否单亲对青少年综合发展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2.809( $p < .01$ )、-.302( $p > .05$ )和 -2.958( $p < .10$ ),说明当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市区、本地户口和单亲的学生的综合发展分别比其他人高 2.809 分、低 .302 分 and 低 2.958 分,其中本地户口的影响作用未达到显著,表明市区的学生的综合发展水平显著高于其他人;单亲家庭子女的综合发展水平显著低于其他人。父亲教育程度为高中和大学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2.369( $p < .10$ )和 2.801( $p < .05$ ),说明当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父亲受过高中教育和大学教育的学生的综合发展分别比其他人高 2.369 分和 2.801 分,这些差异均达到显著水平,表明父亲教育程度达到高中及大学的学生,其综合发展水平显著高于其他人。

在身体状况方面,市区、本地户口和是否单亲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105( $p > .05$ )、.373( $p > .05$ )和 -9.551( $p < .001$ ),说明当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市区、本地户口和单亲的学生的身体状况比其他人分别低 .105 分、高 .373 分 and 低 9.551 分,其中只有是否单亲的影响作用达到了显著,表明单亲家庭子女身体状况水平显著低于非单亲家庭的子女。

在学校生活方面,市区、本地户口和是否单亲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4.120( $p < .001$ )、-1.098( $p > .05$ )和 -2.859( $p < .10$ ),说明当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市区、本地户口和单亲的学生比其他人高 4.120 分、低 1.098 分 and 低 2.859 分,其中只有本地户口的影响未达到显著水平,表明市区学生的学校生活水平显著高于非市区的学生;单亲子女的学校生活水平显著低于非单亲子女。

在家庭生活方面,市区、本地户口和是否单亲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1.921( $p < .10$ )、.678( $p > .05$ )和 -2.276( $p > .05$ ),说明当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市区、本地户口和单亲的学生的家庭生活比其他人分别高 1.921 分、高 .678 分 and 低 2.276 分,其中只有市区的影响作用达到了显著,表明市区学生的家庭生活水平显著高于其他人。父亲教育程度为高中和大学对家庭生活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3.908( $p < .01$ )和 6.268( $p < .001$ ),说明当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父亲受过高中教育和大学教育的学生的家庭生活分别比其他人高 3.908 分和 6.268 分,这些差异均达到了统计上的显著水平,表明父亲的教育程度越高,子女的家庭生活水平越高。父亲职业为国家干部、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技术人员和文秘人员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1.427(p > .05)$ 、 $.738(p > .05)$ 、 $-2.679(p < .05)$ 、 $.395(p > .05)$ 和  $.416(p > .05)$ ,说明当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父亲为国家干部、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技术人员和文秘人员的学生的家庭生活比其他人低 1.427 分、高 .738 分、低 2.679 分、高 .395 分和高 .416 分,其中只有私营企业主的影响作用达到了显著水平,表明父亲为私营企业主的子女的家庭生活水平显著低于其他人。

表 5 “90 后”青少年发展状况的 OLS 回归分析

影响变量	身体状况	学校生活	家庭生活	社会生活	心理健康	综合发展
常数项	76.940	87.717	83.29	1104.308	93.639	88.025
个体特征						
男生 <sup>a</sup>	1.102	-2.027*	-1.986*	-1.311*	2.009*	-.621
年龄	.349	-2.989***	-1.668***	-2.540***	-3.003***	-2.315***
学校特征 <sup>b</sup>						
重点	.324	2.392 <sup>†</sup>	2.603*	.375	2.575	2.911*
普通	3.570 <sup>†</sup>	7.256***	4.688***	3.456**	6.103***	6.329***
家庭特征						
市区 <sup>c</sup>	-.105	4.120***	1.921 <sup>†</sup>	2.237**	3.921**	2.809**
本地户口 <sup>d</sup>	.373	-1.098	.678	-.025	.896	-.302
是否单亲 <sup>e</sup>	-9.551***	-2.859 <sup>†</sup>	-2.276	-.599	-2.433	-2.958 <sup>†</sup>
父亲教育程度 <sup>f</sup>						
高中	.849	.910	3.908**	.218	4.133**	2.369 <sup>†</sup>
大学	-2.769	1.207	6.268***	.706	5.620***	2.801*
父亲职业归属 <sup>g</sup>						
国家干部	-2.046	-1.198	-1.427	-.952	-1.017	-.959
经理人员	.209	1.171	.738	.809	.901	1.521
私营企业主	-.301	-1.743	-2.679*	-1.826	-1.129	-1.730
技术人员	2.786	.773	.395	2.230*	1.400	1.923
文秘人员	2.926	-.099	.416	-.393	-.018	.206
F 检验值	3.644***	31.405***	14.859***	30.866***	23.568***	19.181***
调整后的 R <sup>2</sup>	.023	.220	.112	.221	.189	.177
D.F.	14	14	14	14	14	14
N	1580	1512	1532	1417	1354	1142

注:非标准回归系数。双尾检验统计显著度:! $p < .10$ , \* $p < 0.05$ , \*\* $p < 0.01$ , \*\*\* $p < 0.001$ 。a 男生,以女生为参照。b 学校特征,以民办学校为参照。c 市区,以居住地非市区者为参照。d 本地户口,以本地户口者为参照。e 单亲,以非单亲者为参照。f 父亲教育程度,以初中及以下为参照。g 父亲职业归属,以社会底层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无业及其他人员)为参照。

在社会生活方面,市区、本地户口和是否单亲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2.237(p < 0.01)$ 、 $-.025(p > .05)$ 和  $-.599(p > .05)$ ,说明当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市区、本地户口和单亲的学生的社会生活比其他人分别高 2.237 分、低 .025 分和低 .599 分,其中只有市区的影响作用达到了显著,表明市区学生的社会生活水平显著高于其他人。父亲职业为国家干部、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技术人员和文秘人员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952(p > .05)$ 、 $.809(p > .05)$ 、 $-1.826(p > .05)$ 、 $2.230(p < 0.05)$ 和  $-.393(p > .05)$ ,说明当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父亲为国家干部、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技术人员和文秘人员的学生的社会生活比其他人低 .952 分、高 .809 分、低 1.826 分、高 2.230 分和低 .393 分,其中仅有技术人员的影响作用达到显著水平,表明父亲为技术人员的学生的社会生活水平显著高于

其他人。

在心理健康方面,市区、本地户口和是否单亲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3.921( $p < .01$ )、.896( $p > .05$ )和 -2.433( $p > .05$ ),说明当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市区、本地户口和单亲的学生的心理健康比其他人分别高 3.921 分、高 .896 和低 2.433 分,其中只有市区的影响作用达到了显著,表明市区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显著高于其他人。父亲教育程度为高中和大学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4.133( $p < .01$ )和 5.620( $p < .001$ ),说明当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父亲受过高中教育和大学教育的学生的心理健康分别比其他人高 4.133 分和 5.620 分,这些差异均达到显著水平,表明父亲教育程度为高中和大学的学生,其心理健康水平显著高于其他人。具体参见见表 5。

### 三、结论与讨论

(一)城市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对家庭所产生的正面影响,为“90 后”健康、稳定、快乐成长提供了条件。使当代青少年发展与经济、社会主流发展趋势基本一致。

青少年的综合发展水平居中等偏上。在 1 - 100 的分值中,青少年发展的五项指标均超过了 50,其中,身体状况指标达到了 80 以上,除学校生活(53.46)外,其余几项指标都在 60 以上,这反映出“90 后”青少年的发展与当前上海社会环境的主流发展态势相一致。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上海经济发展实现了历史性飞跃,已进入中等发达经济体行列。<sup>①</sup> 教育经济学认为,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对人口文化素质起积极作用,经济越发达,这个地区的人均受教育水平就越高。研究也证明,我国各地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与人均 GDP 均呈现极为显著的相关(沈百福、杜晓利,2004:57 - 62)。上海经济的飞速发展,无疑为上海青少年创造了优越的受教育环境。由于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上海市民传统的思想观念受到了冲击和挑战,促使家庭的消费结构和消费方式发生深刻的变化,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已成为家庭消费中的新热点。它所产生的结果是使青少年的家庭教育环境更为合理,从而为“90 后”一代的健康、稳定、快乐成长提供了条件。作为我国经济基础最好、信息化起步最早、推进力度最大的城市之一,在“十一五”期末,上海信息化的主要指标预计将基本达到发达国家中心城市先进水平,这显示上海正在急速地迈入信息社会。信息渠道的多元和知识的丰富,令青少年认知能力和思维能力不断发展,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也不断广泛而深入。因此其知识面、早熟度远远超过父母辈,其思维变得更加独立,其评判事物的标准更为多元。可以说,这一代青少年从一出生就身处这个政治稳定、经济优越、文化开放的社会环境之中,青少年整体素质得到提高,家庭教育环境合理,信息化程度较高,这使“90 后”青少年的发展水平得到了很大提升。

(二)“90 后”青少年身体健康水平与学校、家庭教育有较为密切联系;其行为选择与市场经济带来教育、消费、闲暇观念改变直接关联。

尽管“90 后”青少年的综合发展水平较好,但在各个指标上的发展水平并不平衡。相对而言,身体状况的发展水平最高,比其次的社会生活指标高了近 10 分,而居于最后一位的学校生活指标得分与身体状况指标得分的差距约达 30 分,比倒数第二位的心理健康指标得分也低了 10 分左右。为什么青少年的各发展指标会出现如此的差异呢?

第一,“90 后”青少年的身体健康水平与学校和家庭中的教育减负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sup>②</sup>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受片面追求升学率和“重智轻体”思想的影响,一些学校和家长给学生施加了很

① 按当年度人民币对美元的年平均汇率来计算,上海 2009 年人均 GDP 已达到 11320.41 美元。从全球范围看,经合组织(OECD)成员的一般人均 GDP 都超过 1 万美元,这一突破表明上海已进入中等发达经济体行列。

② 本次调查中所设计的身体健康指标主要侧重于学生的健康生活方式,而不在于关注学生的体质状况。因此,在原因方面也偏重从影响学生健康的教育性因素进行解释。因此,本项解释并不否定由于生活水平提高等因素带来的青少年人口体质增强这一原因。

大的学习压力,导致许多孩子睡眠时间不足,也无暇参加体育锻炼,若干身体指标呈现下降态势。为此,上海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保证中小学生睡眠时间,并将“上海中小学生每天至少有一小时体育活动时间”列为“上海学校体育工程推进计划”的六件实事之一。而上海家长对孩子的身心健康也越来越重视,不少家长反映,在身体健康与学习成绩之间选择,当然首先希望孩子身体健康。调查显示,90%以上的青少年在一学期中从未请过病假或仅请过1-2次病假,这从侧面说明大多数青少年拥有较为健康的身体。超过六成(64.4%)的学生每天能保证至少有8小时睡眠,约三成(32.5%)学生的睡眠时间为6-7小时。本次调查发现,有32.6%的学生达到了1小时以上,39.7%的学生拥有1小时锻炼时间,还有27.6%(444人)的学生拥有30分钟的锻炼时间。按照上海“每天至少一个小时”的标准,超过七成的学生在体育锻炼时间上能够达标。这都反映出政府为了改善学生身体状况所进行的一系列的教育改革已初见成效。

第二,“90后”青少年的社会生活发展水平相对较高,这与他们充分享受到国家富强的成果相关。“90后”青少年思维更为独立,评判事物的标准更为多元,更尊重利益多样化。这一代青少年在国家认同、公民意识等方面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并形成了独特的价值观。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学生(89.1%)表示“我为自己是中国人而感到自豪”,觉得“说不清”、“不太符合”和“完全不符合”的分别为7.8%、1.9%和1.3%。另一方面,青少年也乐于为社会服务,且坚持社会共识性的价值观与道德观,但其行动更趋于独立、务实。例如,在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如捐助灾区、义务劳动、学雷锋等)方面,表示“经常主动参加”、“看到或碰到才会参加”、“视情况而定”和“不参加,觉得没意思”的学生分别为28.2%、50.1%、18.6%和3.1%。这表明大部分“90后”青少年并不排斥奉献行为,只是参与公益活动的主动性还不够。当问到在公共场所看到有人损坏公共设施时的反应,选择“与我无关,不管他”、“上前劝阻,不听就算了”和“找来管理人员(或保安人员)阻止他”的学生分别为16.5%、26.6%和57.0%。这表明“90后”青少年能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但其行动却是基于独立、务实的准则。改革开放使上海发展成为一个国际大都市,社会容许度及接受多元文化和价值观的能力大大增强。市场经济改变了人们过去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只强调国家集体利益、忽视个人正当利益的价值观念。从小在一个社会日益宽容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90后”,他们更关注自己的切身利益,关注自己如何融入社会,关注如何为社会所接受。这集中体现在他们对个人生活的追求上。问到“你的个人未来发展目标是什么样的?”,37.5%的青少年选择“快乐度过每一天”;28.7%选择“个人发展与事业有成”;25.4%则选择“赚钱孝敬父母”;而选择“其他”以及目前没有明确目标的学生仅占3.3%和5.1%。这说明“90后”青少年的价值取向日益多样化,他们在树立人生目标时,更多考虑的是“务实”而非“务虚”、更多采纳“现实主义”而非“理想主义”。

第三,“90后”青少年的家庭环境、亲子关系较好,但在家庭的组织性、学习性方面还略嫌不足,这与市场经济带来教育、消费、闲暇观念的转变有关。“90后”青少年的父母大多是出生于60年代,当1978年改革开放时,“90后”的父母们刚开始迈入社会,他们的青年时期也正是在改革开放的社会变革中度过的。1988年张永杰、程远忠著的《第四代人》对“60后”一代的特征作了阐述。作者认为,随着高考恢复、西方文化的传入和市场经济观念的盛行,60后的价值观是自我设计、自我实现、自我负责(张永杰、程远忠,1988)。这一点也充分折射在他们对孩子的教育观念上过去那种要求绝对服从的教养方式被竞争、消费等符合市场经济的教养方式所取代。另一方面,独生子女的家庭结构令这一代青少年的父母非常重视子女的成长与发展,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使他们更有能力为子女提供优质的生活和教育。与同是出生于改革开放时期的独生子女一代“80后”相比,“90后”没有在少年时期经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巨大转变,他们出生于一个物质条件丰盛的时代,从小接触丰富的商品,养成了强烈的市场消费观念和对物质实际和笃定的生活态度。他们对自己所享有的物质财富习以为常,物质对他们的影响已不再是刺激而是一种习惯。由于从父母那里获得的满足度和关注度高,“90后”青少年没有理由反叛,他们与父母和睦相处,更能体验家庭生活的幸福与快乐。但是,市场经济的消费性导向也令不少家庭在组织性、学习性方面有所欠缺。调查中,青少年与父母共同度过节假日的方式以逛街、看电影、旅游等休闲娱乐活动为主,选择听讲座、看展

览等学习性活动的比例较低。只有约 3/5 的(64.2%)学生表示自己“常常和家人一起讨论学习问题”,超过四成学生的家庭作息不规律,这些都影响了青少年的家庭生活。

第四,在独子社会中成长的“90后”青少年很少经历挫折,这种独特的经历一方面令他们的自信心与自我悦纳度更高,另一方面也使他们承受打击的心理能力较弱。调查显示,无论是在人际交往还是自我认识方面,“90后”青少年对自身的能力、外貌以及未来的发展都有较高的评价,表现出较高的自信,认可自身能力和自我价值,并对未来充满期望。64.1%的学生认为自己是一个聪明的人,只有10%的学生对自己的外表表示不满意;67.2%的学生认为自己有能力在社会上成就一番事业。同时,青少年普遍对自己的人际交往充满自信,超过七成(75.2%)的学生表示“只要我愿意,就能交到朋友”。但是,有部分青少年存在着情绪稳定性较差的问题,可能会对其身心发展造成潜在的危害。有21.7%的学生经常感到很沮丧,有4%的学生承认自己在遇到重大挫折时经常想到放弃生命。

第五,部分青少年承受的学习压力较大、在师生关系和同学关系遭遇人际紧张等因素,影响了他们的学校生活。教育心理学研究表明,学习压力水平与学习效率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倒U型曲线的关系,过高或过低的学习压力都不利于学习,只有适度的压力水平才能使处于学习的最佳动机状态。尽管中小学生学习减负工作的推进令“90后”青少年的学习压力有所减缓,在被调查的学生中有62.3%表示学习压力一般或不太大,但仍有27.2%的学生觉得学习压力较大,6.5%的学生感受到非常大的学习压力。随着学段升高,学习压力程度逐渐加大。高考仍然是导致学生学习压力的重要原因,有半数(50.1%)高中生认为自己的学习压力非常大或比较大。在师生关系和同学关系方面,社交紧张情绪较为常见。有占20.9%的学生认为自己在看到老师时会感到紧张与不安,有近三成(29.1%)的青少年承认自己在和不熟悉的同学交往时会感觉到不自然。部分青少年缺乏对他人的理解,缺乏现实交往和沟通的技能。超过三成(32.5%)的青少年觉得“有些同学很讨厌”,表示“不喜欢和异性同学交往”的比例达到了43.9%,还有13.6%的学生“常常被同学捉弄”。

(三)“90后”青少年总体评价:属于在正常社会中获得健康、正常发展的一代。同时应更多关注影响青少年和谐发展关键因素(年龄、学校、城乡差异)。

回归分析发现,在与青少年相关的个体特征(性别、年龄)、学校特征(重点、普通、民办)、家庭特征(居住地、户籍、父亲受教育程度和父亲职业归属)三类变量中,青少年的年龄、就读学校类型以及家庭居住地是影响青少年发展的关键因素。表现为:青少年的综合发展水平随年龄的增加而呈下降趋势;就读于普通学校的青少年的综合发展情况比就读于重点学校的青少年好,而民办学校的学生发展水平最低;市区学生的综合发展优于城镇和农村学生。并且,上述特征同时存在于学校生活、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心理健康四个指标中。

第一,随着年龄增加,“90后”青少年的综合发展水平随年龄增加而显著降低,其中,学校生活、家庭生活、心理健康、社会生活发展水平都显著降低,身体状况发展水平差异不显著。年龄越大的青少年,尤其是初中生、高中生,会更多地感受到升学考试的压力,从而导致学习、心理方面发展水平较低。同时,处于青春期的青少年也更有可能遭遇人际、心理方面的压力和冲突,其价值观更多地受到多元观念的冲击,使他们的社会生活和心理健康面临严峻挑战。这也与对香港青年的研究结果相似:在前后两年的比较中,香港青年的发展指标在德育、智育、责任心、活动参与等指标上都比上一年明显下降(香港青年发展议会、香港城市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1998-2001)。

第二,在民办学校就读的青少年在各项指标上的发展水平都显著低于在普通学校和重点学校就读的青少年。民办学校的生源主要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这个青少年群体在家庭经济条件、父母的教育背景、职业地位等方面都处于相对弱势状态。同时,民办学校在硬件设施、师资力量等方面都与公办学校有较大差距,这些因素都对民办学校学生的发展水平产生了影响。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重点学校学生在学校生活、家庭生活、心理健康三项指标的发展水平上显著低于普通学校学生。这可能与重点学校学生的学习环境竞争更为激烈,父母的教育期望更高,导致其承受了更大的学习

和心理负担有关。

第三,家住市区的青少年在各项指标上的发展水平均显著高于农村青少年。由于我国社会经济城乡二元结构的不平衡性,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市区拥有丰富的物质生活、优质的教育资源,获取知识和信息的渠道更广阔。而农村在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都处于相对劣势地位。目前,研究者从不同角度证明了城市青少年在家庭教养方式、行为自主期望、社会适应行为等方面的发展水平都比农村青少年更高(徐谦、郑日昌,2006:338;张文新、王美萍,2006:868-876;聂衍刚、林崇德,2008:1013-1020)。本次调查的发现再次印证了这一结果。家住市区的“90后”青少年的幸福感、快乐感、自信心都显著高于家住农村的“90后”青少年。

#### 参考文献:

聂衍刚、林崇德,2008,《青少年社会适应行为的发展特点》,《心理学报》第9期。

上海青年研究中心主编:《2009年上海青年发展报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沈百福、杜晓利,2004,《人口文化素质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分析》,《北京大学教育评论》第1期。

香港青年发展议会、香港城市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1998,《香港青年发展指标研究》,参见《香港青年发展议会网》(<http://www.youthcouncil.org.hk/>)。

徐谦、郑日昌,2006,《四川城乡青少年家庭教养方式比较》,《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第5期。

张文新、王美萍、Andrew Fuligni,《青少年的自主期望、对父母权威的态度与亲子冲突与亲合》,《心理学报》第6期。

张永杰、程远忠,1988,《第四代人》,东方出版社。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8, “Inequalities in Young People’s Health: HBSC International Report from the 2005/2006 Survey”, Se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Regional Office for Europe: (<http://euro.who.int/eprise/main/WHO/InformationSources/Publications/Catalogue/20080617-1>).

UNICEF: Innocenti Research Centre. 2007, “Child Poverty in Perspective an Overview of Child Well-being in Rich Countries”, See UNICEF: Innocenti Research Centre (<http://www.unicef-irc.org/publications/pdf/rc7-eng.pdf>).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

责任编辑:朱蕊